

2010年“文津讲坛”讲座选介

古籍馆地方文献组 张毅

阿Q画圆圈与中西文化的发展模式

【主讲人】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以《阿Q正传》为例，通过中西文化演进模式的对比，揭示鲁迅作品的深刻内涵。

首先，精神胜利法与圆圈。阿Q在精神上总是充满一种圆满、团圆，无论有什么不团圆、不圆满，他都可以通过各种办法的解释最终得到一种圆满，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胜利。也即，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个圆圈。而此是与中国文化紧密联系的。西方的时间观是一种直线的的时间观，西方文化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看作基督教文化，认为世界有开头（创世与原罪），有发展和演进，还有结尾（末日审判，天国或地狱），可谓一幕有头有尾的戏剧。而中国的时间观就是一个圆圈。这就是鲁迅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深刻的内涵，其目的就是想打破中国人以画圆圈为特征的这种团圆的迷梦。

其次，阿Q革命与圆圈。鲁迅通过对阿Q革命的描绘，揭示出阿Q式的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农民造反”，一点新意都没有，还是一个循环。如同其在《忽然想到》里面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第三，结尾大团圆，阿Q画圆圈。阿Q是鲁迅心目中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是用否定与批判性的眼光来剖析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阿Q正传》结尾部分阿Q画圆圈，圆圈是既是判决书的画押，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阿Q极力要把这个圆圈画圆，表明他是圆圈这一中国文化符号的极力维护者，但最终也被这个符号杀死。

最后，《阿Q正传》乃至鲁迅文学世界的文化价值评估。推崇二元中和的中国文化，必然在文化的整体结构当中，强调各部分的均衡和和谐，而推崇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必然在文化总体结构当中，强调各部分的对立与斗争。因此中国文化在整体结构各部分的彼此调和和渗透当中缓慢的延续着，这种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连续性、稳定性。而西方文化站在片面的对立冲突当中通过否定性和批判性来达到一种跳跃性和爆破性的发展。

鲁迅的文化价值必须从改换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的角度去认识，即鲁迅有感于中国文化不断转圆圈这种循环论，以及述而不作的连续性、稳定性而造成的静止不动，所以他用阿

Q 这样一个国民的典型，用否定性的方式来打破大团圆，希冀中华民族在列国争雄的时代能够改换那种静止不动的、原地画圆圈的文化运行模式，彻底告别阿 Q 时代，使中国社会动起来，迅猛的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弱肉强食的现代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推荐书目】1、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兼评刘小枫以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归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换个角度看晚清

【主讲人】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摘要】依时间顺序分析现今晚清历史的构建，讲述晚清史是怎样被层层“妖魔化”的。

首先，如何看待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者对晚清史的看法？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政治革命的先驱者、先行者，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康有为，最敏锐的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但是康有为认为，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推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中央政治层面存在一个以慈禧为首的庞大的反改革势力集团，保守派，并且在此认识下，进行了系列活动。戊戌六君子事变后，许多事实真相被掩盖。而逃于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则继续以自身局部的认识和理解，构建了一个晚清的叙事框架，给我们一个误导。梁启超后来即有所反省，以为他的那些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实，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宣传，不能作为历史看。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人们看到更多材料的时候，就能了解其时之全局并非完全如康有为所分析的那样。

其次，如何看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晚清史的构造？康有为、梁启超虽然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但他们仍是失败者，因此他们所述那段历史是按照他们的思路去讲的。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思路是胜利者在写的历史，他们并不认同康有为的看法，认为所有的清政府统治者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反动的，都是要打倒的。

最后，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人对晚清史的分析 and 认识？共产党人对晚清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讲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即共产党打倒国民党，打倒的是孙中山的叛徒，而不是国民党的正宗，因此，在对晚清史的看法上，基本上继承了孙中山的看法。

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批判，如果从政治史的层面去理解，应该说是不错的，作为斗争的双方，他们当然要对清政府持严厉的不妥协的批判立场，然而过了一百多年，如果我们只是延续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批判，显然就无法获得历史真相，只能继续处于云山雾罩中。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既有的成见，抛开意识形态的困扰，抱持一种理解与同情的立场反观晚清，就会得出非常不一样的认识，或许能够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抱持一种

适度的敬畏和崇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考虑到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因而在那十年间，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地妖魔化了。

【推荐书目】1、马勇《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年。2、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普罗文学的政治性与世界性

——小林多喜二、鲁迅与1930年代中日左翼文学的同时代性

【主讲人】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内容摘要】以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为例，介绍1930年代中日普罗文学的同时代性，探索今天的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是否有必要重新恢复文学所固有的批判现实社会的政治性？

诞生于80年前的普罗文学名著，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自2008年开始再次畅销日本，受到挣扎于世界金融危机之下的青年人欢迎。《蟹工船》描写的是在一艘进行螃蟹捕捞、加工成品蟹肉罐头的工作船上，工人们劳动条件恶劣、强度极大，还受到监工浅川的残酷压迫，最后团结起来实行罢工。罢工受到镇压后，工人们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抗资本家及其走狗监工，否则不能取得胜利，于是开始酝酿第二次罢工。这部小说为什么有那样一种感人的力量，在时隔八十年之后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其原因在于在《蟹工船》里，小林多喜二有意识地通过对资本的逻辑分析，向读者展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社会的结构，具有一种深刻的政治性和世界视野，具有一种批判的力量。

小林多喜二1903年生于日本的东北秋田县，其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注意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到后来，他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认识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因此他开始参与工人运动，参加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活动。也由此被所在单位开除，但之后，小林多喜二就专门从事文学活动，写作无产阶级文学作品。1929年3月，小林多喜二通过前期的实地调查，创作了《蟹工船》这部小说，遂成为他的一部代表作。同年，日本成立了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小林多喜二担任中央委员，后来又任书记长。1931年，日本政府宣布日共为非法组织，故日共转入地下，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小林多喜二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后来成为该党的中央领导人。1933年2月20号，小林多喜二的秘密住

后被警察发现，最后被活活打死，年仅 29 岁。

《蟹工船》1929 年 3 月份完成，5 月份在日本的《战旗》杂志上发表。次年初夏衍先生就对它予以了评论和介绍，其《包身工》就是受到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的影响而创作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1930 年下半年，潘念之将《蟹工船》译成中文。小林多喜二被害数日后，鲁迅便发电报表示哀悼，并称其为“同志”。

中日两国普罗文学运动几乎是同步出现的，它们都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其时，中日两国进步的左翼人士曾并肩战斗，一起在上海参与推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如两位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日本新闻记者山上正义与尾崎秀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作为外国记者或者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人士的一般活动，更是与中国左翼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的，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左翼革命家的行为，体现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世界同时性和中日两国普罗文学的紧密关联携手互动。

【推荐书目】1、小林多喜二著，应杰、秦刚译《蟹工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2、小林多喜二著，叶渭渠译《蟹工船》，译林出版社，2009 年。3、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 年。4、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晚明专制政治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

【主讲人】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摘要】晚明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专制政治松动并出现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

首先，何谓“晚明”？晚明始于万历时期。由于我们对晚明发生的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或是我们沿袭了传统的认识，听信了清朝皇帝的说法，明亡于万历；或是受到明朝遗民对于亡国的反思和批评的影响；或者不恰当地将晚明与明初太祖、太宗的时代相比；再或者就是未能全局把握，只看到晚明的政治是腐朽的，致使我们很多时候都误读了晚明史。其实，晚明时代是一个商品化发展非常繁荣的时期，整个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晚明的变化是划时代的，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变化。

其次，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晚明时，政治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上是朝臣对于朝廷的批评，在下是公众私议朝政，所有的人都关心政治，都谈论政治，表述自己的观点，如揭帖（即大字报或小字报）、“横议”（即言论无所顾忌），人们政治观念发生变化，政治局势非常宽松。

最后，早期人文主义。晚明时代的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表现形式是对君主政治的批评和个性追求。人文主义之所以可以成为主义，一定是由精英思想转变为大众行为，变成全社会的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一定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批判而产生并发展的，它一定是反传统的，晚明恰恰是如此。西方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

明朝的后期无论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都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此时，中国处在和西方同一个起跑点上，然而由于明朝走上了一条非常困惑的无法解决的道路，使其走向了灭亡，中国也失去了一个迈向近代的机会。

【推荐书目】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年。2、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3 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4、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制度变革滞后与清王朝的覆亡

【主讲人】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摘要】通过对清王朝覆亡之路的讲述和分析，指出清政府制度变革的滞后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观念是“世界之中”，认为中国就是“天下”。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面临新的文明的挑战，但几乎无人意识到这个意义。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反被认为是背叛中国文化的罪人，在其往赴流放地新疆的途中，把自己搜集的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充实资料，编成了《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当时很多事情并未能“师夷长技”，而是围绕着“师夷长技”对不对、要不要“师夷长技”展开的。

及至二十年后，曾、左、李洋务运动方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洋务派仍面临重重困难，与顽固派之间关于修铁路、造轮船、架电线等产生了种种争论。

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其具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维新派虽无为官者，但是声势很大，原因在于办报，故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人办报论证的传统。第二，组织社团，讨论政治，成为后来政党的雏形，与传统的秘密会社截然不同。第三，反对缠足，对妇女的解放。

义和团的悲剧。第一，义和团是个反侵略的正义事业，但被一个腐朽的力量所利用，以致跟近代有关的进步事物都要毁坏掉。第二，义和团被利用完后，又变成替罪羊，反过来被官军镇压。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对政府来说，不要轻易鼓动民心民意，鼓动起来的民间情绪易过火，其方向和范围会很难控制；对人民群众而言，不要认为所做的事情很正义，很有道德，还有统治者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经济制度的变革一样滞后。

清政府一路走来，每次变革都是被动的，总是拒不复新，总是在下一个阶段做上一个阶

段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到后来它一直面临着革命和改革的赛跑，但是它自身并未察觉，仍拒绝改革，然而拒绝改革必然就要接受革命，致其覆亡。

【推荐书目】1、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2009年。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3、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

说古道今谈改革

【主讲人】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

【内容摘要】通过介绍、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启迪我们对当代改革的思考。

当前形势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求新；第二个特点伴随第一个特点而来，是自喜。一味地求新、盲目的自喜会给我们的改革带来很多问题。忽视历史，忽视传统，必将要受到历史和传统的惩罚，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一看改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有两种方式，革命与改革。二者中，革命不应是常态，常态是改革，只有改革没有出路、行不通的时候，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方方面面使改革没有办法推行下去的时候才需要革命。当然，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一定要肯定，不容否认。

从宏观上看，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中国最早的国家的产生就是改革的产物。

在这样一个改革的历史长河中，改革与传统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秦始皇和王莽为例，一味地求新或者一味地保守都难以达到预定目的，只有继承优良传统，并且同时不断的创新，二者巧妙地结合，平衡发展，才能使走得长远。

从传统王朝来看，改革当中有三个条件值得重视。第一，皇权。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没有皇权的支持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在今天则是党，党必须是坚定的改革者，毫不动摇，改革开放。第二，改革者的素质。第三，民众的认知程度。除了既得利益集团会对改革形成阻力外，人们的观念也是。比如人是有惰性的，在一种环境下生活久了、习惯了，一旦要变就会不适应，如果改革的措施、政策在某些方面再有考虑的不周的话，就会使这些不适应不断地扩大，甚至会产生对改革的抵触。

改革与家法和祖训的关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要突破祖训。

要对当下的改革有信心。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时间也将检验我们的改革。